



杜钢百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付佳 选编

杜钢百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
與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杜钢百文存

DUGANGBAI WENCUN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付佳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钢百文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付佳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1

(清华国学书系)

ISBN 978-7-214-21450-8

I. ①杜… II. ①清… ②付… III. ①杜钢百(1903—1983)—文集②经学—文集 IV. ①Z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6489 号

书 名 杜钢百文存

主 编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选 编 付 佳

责 任 编 辑 王保顶 张晓薇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插页 2

字 数 151.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450-8

定 价 3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青年杜钢百



老年杜钢百

总 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桢、吴其昌、高亨、刘

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

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目 录

杜钢百生平与学术	1
《中庸》伪书考	25
公羊谷梁为卜商或孔商讹传异名考	32
孔氏撰修《春秋》异于旧史文体考	42
评当代学者论儒家著作之失	52
从当代思潮导出经学之认识与其批判态度	71
经字考释与经名溯原	82
论大学课程中之经学研究	90
名原复音广证	109
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发展计划书	115
与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先生论中文系(?)改革意见书	124
检讨国内大学中文系(?)之“名称”“课程”及其组织	130
张百祥革命事略	144
回忆王右木烈士	150
万县惨案和朱德、陈毅同志	153
“九五”惨案见闻	156
谈笑风生 惊涛骇浪	163
杜钢百先生年表	174

杜钢百生平与学术

杜钢百(1903—1983),原名杜文炼,字钢百,以字行,四川广安人。出身富庶之家,少时多习诗词古文,有志于学,先后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还曾拜入经学大师廖平门下,得其亲传。杜钢百一生以教学为主业,曾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多校任职,讲授经学、史学课程,长于先秦经学研究。同时,他多年来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参与爱国民主运动,为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贡献良多。

一 杜钢百之生平^①

1903年3月,杜钢百出身于四川省广安县石笋河场一户富裕人家。杜家在当地为大族,颇具声望。祖父杜太翁是一位饶有田产的地主,又

^① 关于杜钢百生平事迹,主要参考了赵彦青《杜钢百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七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16—223页),刘达灿《“多宝道人”杜钢百》(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6bc80e0100demm.html)、《“多宝道人”杜钢百(续前)》(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6bc80e0100demo.html)、《“多宝道人”杜钢百(续前二)》(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6bc80e0100demr.html),杜钢百《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活动简况》(《四川省统战工作史料》,1985年第3期,第53—55页)。

经营米粮生意,家境殷实。杜太翁夫妇持家有道,为了壮大家族,维持长远发展,让诸子分别择业,或务农,或经商,或读书入仕,兄弟之间相互补给、帮衬,奉行均衡培养人才的发家策略。杜钢百的父亲杜人品选择的是经商之路,他这一房不仅资财优渥,且人丁兴旺,有九名子女,杜钢百为其次子。富足的家庭使杜钢百拥有较为优越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安心于读书求学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 求学之路

杜钢百四岁即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童蒙识字教材,有了文字基础后,又习“四书”、“五经”、《昭明文选》等,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旧学根底。同时,他还时常跟随家中姑姊在从德女中学习,读新式的商务教科书。大约在1917年,杜钢百十四岁的时候,他正式进入县立高小学习。1919年,考入了县立广安中学。广安的新式学校最先是由维新派人士蒲殿俊、胡骏等人倡办的,杜家又与蒲殿俊素有往来,故而杜钢百少时便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了解到四川经学大家廖平是维新思想的先导,正是他的著作启发了康有为,他便对廖平及其经学研究萌生了兴趣,心生向往。

1920年,还在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杜钢百便参加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招生考试并被录取。这次考试对杜钢百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他之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参加这次考试本身也一波三折,富有一定的戏剧性。原本他在萌发越级参加考试的想法时,家中长辈便极为反对,而他竟以送兄长赴省城为名,偷偷向账房支取了盘缠,跟随兄长一并到了成都,参加考试并一举得中。放榜之后,他却被同乡名落孙山的人检举,原因是他中学未毕业,冒用别人的毕业证书参加考试。后经成都高师学监王右木调查,发现他各科成绩都很好,便召他前来问询。他对自己冒用别人毕业证之事直认不讳,坦言他在得知有中学毕业文凭比同等学力的人考分要求低时,怕自己考不上,才如此行事。王右木见他态度诚恳,且所考成绩已达到了同等学力考生的考分要求,

就决定破例将他录取。由这次特殊的考试,可以看出杜钢百果敢坚决、不拘于俗的行事风格。

当年9月,杜钢百正式进入成都高师学习。在这里,遇到了两位对他人生影响至大的人,一位即高师学监王右木,一位是经学大师廖平。这里先讲他与廖平之关系。在入校后不久,经高师教员谭炯介绍,杜钢百得以谒见钦慕已久的廖平,并被收为入室弟子,一偿夙愿。当时廖平名义上是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又兼成都高师教授,但因病长期修养在城南的家中。杜钢百除了在高师读书外,长时间在廖平家中承教,得他口传面授,先后长达三年之久。廖平先是向他口授了著作《孔经哲学发微》,后又选讲了《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等代表作,从而使杜钢百逐渐了解廖平经学思想的精要,步入了廖平庞大的学说体系中。在这三年中,他在廖平的指教下,遍读了廖氏所著之书如《四益馆丛书》、《六译馆丛书》等,又阅读了不少清人解经之作,学业日益精进,不仅积累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并掌握了经学研究的门径,确立了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旨趣,奠定了治学根基。廖平学术研究中遍通群经、博学善思的特点也为杜钢百所继承。且廖平晚年笃好中医,致力于医学典籍整理与研究,这也开启了杜钢百对中医的兴趣。这段时期,杜钢百在读书积累中还不断思考探索,开始选题著述并有所得,写成了《名原考异》与《中庸伪书考》两篇长文。

1924年,他于成都高师毕业后,与同乡一起赴京求学,凭上述两篇论文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录取。次年,因得知新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延请了名师,便转而投考清华,成为了清华国学院首届学生,导师为梁启超。在这里,他得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学贯中西的大师的言传身教,学习了“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古金文字”、“中国通史”、“方言学”、“普通语言学”等课程,在廖平学说之外又接受了新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对以考据、实证为主的史学研究方法,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按照国学研究院的规定,学生须选一专门课题为研究对象,在导师指导下,写成论文,考核合格后方能毕业。杜钢

百入学时所选题目为“佛家经录之研究”，或许是基于对经学研究的兴趣和学术根基，他最终以“先秦经学微故”为题撰写论文，通过了毕业审查。除了课程学习，国学院还时常举行讲座，师生之间进行讨论切磋，并一起创办学术杂志。杜钢百与同学刘盼遂、吴其昌等组建了学术团体“实学社”，以“实事求是整理国故”为宗旨，并发行了《实学》杂志，响应其时正盛的整理国故运动。杜钢百所作的《名原考异》、《中庸伪书考》两篇文章也被部分节录刊载于《实学》杂志（《名原考异》发表时改名为《名原复音广证》）。不仅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初有所成，杜钢百还参与了研究院及学校的事务性工作，担任研究生会主席，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1926年初发生的关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存废及宗旨的论争中，研究院学生认为时任主任的吴宓不能为学生争取利益，杜钢百和吴其昌作为学生代表，向吴宓递交了要求其辞职的“哀的美敦书”，并致信校长要求辞退吴宓的主任职务，直接导致了吴宓从研究院辞职。他还带着参与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研究院的前途感到深切的忧虑，对研究院未来发展作了深入的思考，撰写了一篇文章即《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发展计划书》，在《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经过在京的两年学习和历练，杜钢百在学术研究与经世处事上都有提升，渐趋成熟，开始步入了独当一面的事业之途。

（二）教学生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时局的纷乱和时势的动荡，知识分子大多难以安守一域，拥有长期、稳定的职位。自1926年离京回川至1941年落脚重庆，这十五六年间，杜钢百饱经流离，辗转多地，于多所大学中任职。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之后，他选择回乡工作，但并未径直赴川，而是绕道上海，去拜访他素来仰慕的康有为。但此时康有为已前往庐山避暑，他又赶赴庐山，在那里谒见了康有为。两人就经学问题讨论良久，相谈甚欢。9月，他回到成都，在廖平的推荐下，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教学生涯中，特别是早期的谋职过程中，廖平的威望和

人脉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助益。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杜钢百由于参与了革命运动,无法在成都立足,逃亡浙江,隐居在西湖边上的广化寺。通过廖平的介绍信,他结识了在杭的国学大师熊十力、马一浮,并深得熊十力赏识。又经由熊十力推荐给了蔡元培。蔡元培时任民国大学学院院长,将杜钢百聘为大学委员会委员。

1928年,经蔡元培推荐,他前往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兼任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教授,正式登上了大学讲坛。20世纪2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名家云集,中西新旧人士各占一席之地,互相争鸣。杜钢百讲授的课程内容是传统的经学,但却试图求新求异,而开设了诸如“春秋国际公法”这类甚为新奇的课程。所谓“国际”,指春秋时期征战不休的各诸侯国,“公法”是指汇集商周典制的《尚书》,课程应旨在将一些现代观念、术语渗入经书解读,从而开辟经学研习的新路径。据他自己回忆,这门课还颇受学生欢迎。在武汉大学的课程,是他在经学教学上作出的尝试性探索,体现出年轻气盛、好发奇思的一面。杜钢百在武汉大学任教时间不长,一年之后,他便离校东游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曾与一些日本学者谈经论史,同时搜求了不少文史书籍。翌年回国,先是在上海开了一家名为“草堂书舍”的书店,卖古旧线装书籍,之后受聘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赴广州任教。在中山大学期间,他亦以讲授经学为主,开设了群经概论、经学通史、《春秋》研究、《诗经》研究、《论语》研究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不断探索传统经学课程应该如何融入与适应现代大学教育,逐渐琢磨出一套成体系的教学思路,对于经学课程设置、经学概念诠释、经学史以及单部经典的研读原则与方法都提出了具体的见解,并发表了论经学教育的专文,如《论大学课程中之经学研究》。大约是在1934年,杜钢百又到上海,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兼图书馆馆长。他在暨南大学所授仍是经学课程,并编写了《经学通史》、《春秋研究》两部教材。任教暨南的五六年间,他在学界交游益广,更开阔了视野。1935年,他参加了章太炎在苏州创办了国学讲习会,对与廖平学术思想和路数大相径庭的章氏学说,他也多有接受,这在他的研究中皆有体现。1934年,他还

曾给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美籍教授韩玉珊及夫人讲述了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会晤论学始末,由韩玉珊翻译为英文,寄给美国约翰·杜威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大学陆续迁往内地,杜钢百仍留沪上,坚守教育阵地。他领导上海大学教教职工联合会组织起战时大学,继续为留在上海的学生授课,直到上海租界完全沦陷。之后,他去了香港,在港联合文艺界左翼人士,准备继续创办战时大学,由于他坚持要将学校冠以“抗日”之名,香港总督慑于日本政府压力而未批准。1940年,他由香港回到广安老家,之后便去往重庆,自此结束了经年的辗转漂泊,于渝定居。1940年至1949年,他一直担任四川省教育学院教授,并创办、经营了两所专科学校,即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和东方人文学院。草堂国学专科学校(简称“草堂国专”),起初由抗战南迁的东北大学教授丁山、高亨、孔德等创议建于四川三台。1944年秋招生甫毕,便由于地方豪绅争权导致学校内部矛盾,孔德在杜钢百支持下,带领部分学生前往重庆,在北碚另成立一所草堂国专,由杜钢百任校长。这所学校具有一定规模,有学生近百人,教师十余人,分文史、文教、文艺、文哲四个专业。除杜钢百主讲经史,主要邀请了当时在渝的大专院校、国立编辑馆、礼乐馆的教授、学者进行讲演。知名学者马衡、熊十力、顾实、汪东、卢前、傅振伦、殷孟伦、周谷城、陈子展、鲁实先等曾先后在该校讲学、授课。草堂国专曾三迁校址,1946年迁南泉,1947年再迁沙坪坝,至建国初方停办,共培养学生数百人。杜钢百不仅倾力于教授课程、管理校务,还以个人之力为学校提供资金,据悉他曾为了筹措经费而将朋友的地产抵押借款,足见其热衷于教育兴学,心诚志坚。东方人文学院,亦是以教习经史为主,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具体情况不详。同时,他也一直致力于图书馆的建设,1947年重庆图书馆协会成立,以探讨图书馆学学术、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宗旨,吸收了图书馆界80余人为会员,杜钢百任常务理事。

1950年,四川省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杜钢百亦随之成为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历史系教授,直至去世。建国前杜钢百一直以讲授经学课程为主,而进入西师后,历史形势和社会

环境已不允许再从事经学教学和研究,他只能开设历史方面的普通课程,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教育史、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等。

(三) 社会活动

杜钢百不是一位完全沉浸于书斋的学者,他既有经世之志,亦有济世之才,在从事教学、研究的同时,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

杜钢百少年在家乡时,听闻了同乡张百祥的事迹^①,对他颇为崇敬,而生效法之心,隐然有投身革命之念。加之身处在新旧思想激荡的社会,时代变革气氛对青年人的感召,冲破大家庭的束缚、对自由精神与生活的追求向往^②,以及川人天生的江湖气,都让青年的杜钢百身上涌动着纵身激流、搏击风浪的热血热情。进入成都高师后,又受到了学监王右木的直接影响。王右木是四川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向杜钢百介绍了马克思思想,不断提供《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给他阅读,让杜钢百接触到了其时国内方兴的共产主义思潮。对于正渴求自由和新思想的杜钢百来说,王右木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非常符合时宜的,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之后他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参加了王右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并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如去茶馆教工人习字等。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和接受,成为了杜钢百之后行为观念、立身处世的重要思想原则,而加入并追随共产党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的人生选择。

1925年,杜钢百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两年间,正值时局动乱、学运频发之际,杜钢百在学习同时亦大力投

① 张伯祥(1879—1914),四川广安人。擅长武艺,曾留学日本,为共进会第一届领袖,章太炎称其为“长江大侠”。回国后参与发动武昌起义,后于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牺牲。

② 杜钢百青年时叛逆离家,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逃避家中安排的婚姻。他晚年时曾对家人谈及为何革命思想对他们那一代年青人极具诱惑力,他认为其中重要原因是新思想提倡民主自由,鼓励冲破家庭束缚追求婚姻自主。

身学运中。1925年3月,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生运动,为首的郑德音、张平江、甫正声都是杜钢百的同乡,他与女高师学生配合,负责校外联络工作,争取校外同学支持女高师的学潮,让女高师发表的各种“宣言”能及时得到社会上的响应和支持。1926年,在赵世兰(赵世炎之妹)介绍下,杜钢百结识了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陈毅。应李大钊扩大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指示,他在京四处奔走联络,成立了两个进步团体。一个是“四川革命青年社”,由他和朱近之发起。另一个是在陈毅的鼓励下,由他和北大学生孙东壶发起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新军社”,意为新军崛起。并创办了社刊,名为《新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拥护国民革命和北伐。“三·一八”惨案中,这个组织一些人牺牲了。之后杜钢百还参加了逼迫当局悼念“三·一八”烈士的斗争。

1926年,杜钢百于返川途中,在武汉与陈毅相遇于渡口。陈毅此时正欲前往万县作四川军阀杨森的动员工作,想要劝服他参加北伐战争。因杜钢百与杨森是同乡,又有参与组织动员的斗争经验,于是陈毅便邀他同行。在陈毅的劝说之下,杜钢百与他一起前往万县。到了万县,杜钢百先是单独前往杨森府邸拜访,跟他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革命思想,希望能鼓动他参加北伐。杨森对他的谈话表示出兴趣,但对是否参与北伐则未表明态度。之后他们与已在万县开展工作的朱德汇合,成立起工作小组,共同展开争取杨森的工作。适逢英国军舰在长江中浪沉了杨森运军饷的船只,他与朱德、陈毅商议决定利用此次事件激发杨森的革命意志,鼓动杨森对英军进行声讨。杨森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命部队扣押了英国在万县的两艘货轮,与英方交涉。同时,工作小组联络万县各界,开展声讨英军的动员大会。9月4日,万县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9月5日,因谈判交涉失败,英军欲强行夺回被扣押的船只,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均损失惨重。且英国战舰炮轰长江两岸的民宅,战火波及无数民众,造成了数百平民惨死,史称“九五事件”或“九五惨案”。在开火之前,杜钢百被派往了重庆联络重庆党委书记杨闇公等人,制造舆论,呼吁声援万县。后陈毅也来到重庆,在他们共同努力

下,重庆、成都等地声援万县的群众斗争风起云涌,反帝浪潮由全川波及全国。这是杜钢百参加革命运动中经历的一件大事,之后他也多次谈起,或诉诸文字,写一些回忆文章。杜钢百在万县虽然受到杨森的礼遇,但最终并没有成功说服杨森。他于9月离开重庆,在成都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邓锡侯二十八军督办公署的顾问,秘密进行革命联络、组织、宣传活动。一度还出资创办了报纸《革命新闻》,以揭露时弊、声讨军阀恶行为宗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杜钢百的文章及其他一些文献中,都记载了陈毅、朱德曾一再劝说他放弃书斋,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然而他却一再推辞拒绝,一直奔走在社会工作与教书治学之间。当然,这两种身份有互补的一面,如他有文化人的笔头、口才之长,在宣传和统战工作中能有所发挥,他的学者身份、所办书店和学校也便于为开展地下工作提供掩护;而他的经世之志也为他探求经学在当下的适用性和发展前途提供了原动力。不过,在二者之间游走、徘徊,无法全情投入一项事业中,虽然丰富了人生阅历,却未能在领域内取得更突出的成就。他的内心应该更倾向于做个学者、教书先生,然而纷扰的时势和经世的志向却又让他不能不关怀现实。知识分子在遭逢变乱之际,往往表现出进退踟蹰的一面,这在杜钢百身上也有充分体现。

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30年代初到了上海才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开始从事地下工作。他在上海以书店为掩护,负责一个情报组织。因他交际面广,结识了国民党元老谢持、杨沧白、柳亚子等人,并与陈立夫、陈果夫、曾扩情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也有交往,能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搜集情报,并秘密传递出去。又与吕一峰一起接管了由黄埔军校成员所办的神州通讯社,担任负责人,后来还把社里工作的几个年轻共产党员介绍到了陈毅的部队中去。40年代,回到重庆后,他所创办的“草堂国专”和“东方人文学院”也常收纳进步青年,为开展地下工作提供场所。如《挺进报》编辑地下党员陈柏霖,就曾以“草堂国专”学生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东方人文学院”也曾收留过华蓥山游击队的成员和家属。内战期间,随着国共斗争日益加剧,国民党在